

# 从“塔利班”到“新塔利班”<sup>\*</sup>

——伊斯兰复兴在阿富汗部落社会的形构与表达

闫伟

塔利班运动在宏观上反映了普什图族的诉求，但其长期存续与微观的部落社会生态息息相关。阿富汗部落社会兼具宗教和世俗两种权威，并以此建构了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阿富汗长期的战乱导致部落社会的秩序解构。以农村的毛拉和迪欧班德派宗教网络为基础的宗教权威，逐渐取代以部落首领为主的世俗权威，成为部落和地方社会的主宰。这构成了塔利班运动兴起的微观社会环境。2001年之后，部落社会的基本生态并未随着阿富汗重建而发生根本变化，塔利班借势再次崛起，与部落社会建立了紧密的纵向联系；塔利班组织内部的横向联系呈现出多中心、分权化的特征；在宗教观念上日趋实用与温和。这体现了塔利班对部落社会的适应。但是，塔利班也具有超越性，使松散的部落在宗教的旗号下实现联合。这代表了西亚北非伊斯兰复兴的另一种重要类型，即与城市伊斯兰复兴的“大传统”相对应的“小传统”，并对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重大威胁。

**关键词：**阿富汗 部落社会 塔利班运动 伊斯兰复兴运动 小传统

**作者** 闫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兵不血刃地再次夺取了阿富汗政权，其宗教意识形态倾向逐渐明晰。塔利班的崛起与当代政治伊斯兰具有明显的不同，它以农村和部落社会为基础，发展壮大，并逐渐攻占城市。这体现了部落社会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深度嵌合。长期以来，伊斯兰教被视为城市的宗教。<sup>①</sup>城市无疑在宗教信仰与义理、宗教思想与文化、宗教法律与教育等方面处于中心地位。这可谓是伊斯兰教作为精英或城市文化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但从历史上看，中东社会由城市、部落和宗教群体三大支柱构成，<sup>②</sup>宗教不仅渗透到传统城市社会的各个方面，构成传统城市社会组织的基础，而且也与广泛存在的部落组织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农村和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阶段成果。

① Sami Zubaid, “Is there a Muslim Society? Ernest Gellner’s Sociology of Islam”,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4, Issue 2, 1995, p. 156; 车效梅:《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第63页。

② Ira M. Lapidus,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Islamic History”, in Philp S. Khoury, Joseph Kostiner eds.,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25 - 27.

部落社会中的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却长期遭到遮蔽,关注者寥寥。<sup>①</sup>

从社会史角度看,城市与部落构成了伊斯兰教发展的两条不同路径。相较于城市而言,伊斯兰教在部落社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向,并且是影响中东历史与现实发展的重要因素。宗教力量与部落社会相结合挑战国家政权,进而建立新的王朝统治,成为中东反复上演的帝国兴衰剧目。<sup>②</sup> 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北非的穆拉比特王朝等大都是在宗教力量的动员甚至领导下,通过部落征服建立的王朝。近代以来,尽管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推进,部落在一些地区有所衰落,但伊斯兰教对部落社会的影响仍然持久。北非的阿拉维王朝、塞努西运动、苏丹的马赫迪运动,以及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运动大都存在部落社会与宗教力量不同程度的合作。随着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不仅城市中出现了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运动,伊斯兰潮也对农村尤其是部落社会深度浸染。这已成为影响当代伊斯兰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甚至一些西方学者将部落主义视为第五波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sup>③</sup> 伊斯兰国、也门的胡塞武装、利比亚的反政府武装,索马里、萨赫勒地区和巴基斯坦的一些反政府运动等兼具伊斯兰主义和部落主义的双重因素。<sup>④</sup> 尽管将上述宗教运动统一归结为恐怖主义有失偏颇,但也反映出伊斯兰复兴运动重心下移的新趋势,即部落社会逐渐成为除城市之外政治伊斯兰的新载体。<sup>⑤</sup>

其中,阿富汗塔利班运动具有典型性,以至于一些学者将部落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称之为“塔利班化”。<sup>⑥</sup> 本质而言,塔利班运动就是由部落社会中的毛拉阶层领导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是宗教运动、部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杂糅。<sup>⑦</sup> 从宏观上呈现出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征,但在微观上则以部落主义为基础。<sup>⑧</sup> 这种宗教与部落联合的模式在阿富汗乃至其他中东国家的历史

① Lois Beck, “Islam in Tribal Societies”, *Reviews in Anthropology*, Vol. 17, Issue 1-4, 1991, p. 66.

② 伊本·赫勒敦最先提出了这一现象,并将之总结为“四代周期律”。Ira M. Lapidus,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15; Ibn Khaldun, *The Muqaddimah: A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82-184; Sami Zubaid, “Is There a Muslim Society? Ernest Gellner’s Sociology of Islam”,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4, Issue 2, 1995, p. 173.

③ Jeffrey Kaplan, *Terrorist Groups and the New Tribalism: Terrorism’s Fifth Wave*,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Jeffrey Kaplan, Christopher P. Costa, “The Islamic State and the New Tribalism”,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5, Issue 5, 2015, pp. 926-969.

④ 巴基斯坦裔学者艾哈迈德指出,美国的反恐战争事实上指向的是部落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Akbar Ahmed, *The Thistle and the Drone: How America’s War on Terror Became a Global War on Tribal Islam*,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3, pp. 1-42.

⑤ 尽管这些宗教运动大都具有传统主义的色彩,但其中掺杂了大量部落和地方文化的因素,并不完全等同于萨拉菲主义。例如,塔利班运动对于苏非圣人和圣墓的崇敬,以及其信仰体系中具有大量部落传统文化和习俗。因此,本文采用“伊斯兰复兴运动”这样相对中性的称谓。相关论述参见 Anand Gopa, Alex Strick van Linschoten, “Ideology in the Afghan Tali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Report*, 2017, pp. 9-32.

⑥ Bilveer Singh, *The Taliban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 Losing the War on Terror to Islamist Extremists*, Westpor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⑦ 闫伟:《塔利班运动及其伊斯兰实践新探——兼论中东政治伊斯兰的“塔利班化”新动向》,《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66-71页。

⑧ 国内外学界对于塔利班运动的研究较多,但是主要从国际政治、伊斯兰主义和普什图民族主义的视角进行探讨,很少涉及其中的部落因素。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 at War 2001-201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Robert D. Crews and Amin Tarzi, *The Taliban and The Crisis of Afghanistan*,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hmed Rashid, *Taliban The Power of Militant Islam in Afghanistan and Beyond*, London · New York: I. B. Tauris, 2000; 何明:《塔利班政权的兴亡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闫伟:《塔利班运动及其伊斯兰实践新探——兼论中东政治伊斯兰的“塔利班化”新动向》,《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闫伟:《阿富汗塔利班崛起的历史逻辑》,《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8期;张杰:《阿富汗局势发展中的塔利班因素》,《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

上曾反复出现，成为影响阿富汗重建的关键性因素，并已外溢到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因此，从部落社会的视角对塔利班运动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重新审视阿富汗的变局，对于进一步客观和全面认识当代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也有所裨益。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学界已开始对部落中的伊斯兰教有所研究，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以艾哈迈德（Akbar S. Ahmed）和哈特（David M. Hart）等学者为代表，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探究伊斯兰教在部落社会的角色与功能。<sup>①</sup>特别是，艾哈迈德曾担任巴基斯坦的地方官员，对于阿富汗的普什图部落社会<sup>②</sup>有着精深的研究。二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于城市与部落社会的伊斯兰教进行比较研究。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ner）提出了城市伊斯兰教和部落伊斯兰教的二分法，并以此分析穆斯林社会的历史变迁。<sup>③</sup>

总体来看，这些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伊斯兰教在中东的部落社会和城市中具有不同的结构与表达。特别是，在塔利班再度崛起的背景下，部落社会不仅是支撑塔利班运动的社会基础，在宗教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塔利班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塔利班崛起的模式在伊斯兰世界也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对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与稳定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对于宗教与部落社会的具体关系是什么？宗教如何动员部落社会，以及如何影响国家政治等重要问题的研究仍然有待加强。本文以阿富汗塔利班为个案，尝试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塔利班运动与阿富汗部落社会的关系，以便为认识当代伊斯兰复兴的新趋向，以及阿富汗问题的深层结构提供一定的镜鉴。本文以宗教社会学为视角，在探讨部落社会与宗教力量互动关系的基础上，重点阐释2001—2002年塔利班如何利用部落社会再度崛起，为认识阿富汗变局以及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提供帮助。

## 二、部落社会结构失衡与塔利班存续的微观社会生态

部落是塔利班存续的微观社会环境。阿富汗部落社会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其社会秩序依赖宗教与世俗二元权威的维持。阿富汗问题的产生，致使原有的权威结构失衡。在部落社会中，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的毛拉阶层借助迪欧班德派宗教网络和意识形态，填补了部落的权力真空，而且在“圣战”的旗下实现动员。这成为塑造塔利班运动及其宗教观念的结构性因素。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塔利班运动是中东地区宗教对于部落社会的又一次动员和整合。

### （一）伊斯兰教在部落社会的形构与功能

塔利班是部落社会权力失衡的产物。阿富汗部落社会属于“分支型社会”，即社会组织沿着血缘和宗族的界限，裂变为大小不一、互不统属的社会群体。社会呈现出高度的分散性，处于无政府状态。但部落社会并非无序，其社会秩序由世俗和宗教两极权威维系。前者以部落首领和部落大会（支尔格大会）为载体，以世俗的部落习惯法为社会规范；<sup>④</sup>后者主要体现在毛拉和圣人，他们并不具有部落身份。部落社会中并不存在乌里玛阶层。两种权威相互独立，世俗权威处

① Akbar S. Ahmed, David M. Hart eds., *Islam in Tribal Societies: From the Atlas to the Indus*, New York: Routledge, 1984; Akbar S. Ahmed, *The Thistle and the Drone: How America's War on Terror Became a Global War on Tribal Islam*.

② 普什图人在巴基斯坦称为帕克同人（Pukhtun）。Akbar S. Ahmed, *Pukhtun Economy and Society: Tradition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Trib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80.

③ Ernest Gellner, *Muslim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④ Olivier Roy, *Islam and Resistance in Afghani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5.

于主导地位，宗教人士一般无权参与部落事务。<sup>①</sup>特别是，毛拉由特定家族担任，地位较为低下，<sup>②</sup>没有制度化的宗教网络作为支撑。但这一群体借助迪欧班德派进行动员，构成了后来塔利班的领导力量。<sup>③</sup>

虽然，部落社会由世俗权威掌控，但宗教权威并非可有可无。一是伊斯兰教将相对闭塞的部落社会纳入更为广阔的伊斯兰世界，并成为社会权力的重要象征。部落组织往往支持某一圣裔家族，或者强调部落的神圣的起源，以获取在社会中存在的合法性和具有崇高的地位。<sup>④</sup>二是由于部落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传统的世俗权威在解决冲突上有时存在失效的现象。那么，宗教权威就成为调解部落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屏障。<sup>⑤</sup>三是伊斯兰教具有整合松散的部落社会的功能，也是实现部落社会实现联合与统一的粘合剂。“宗教是‘加强对社会制度整合最为基本的情感’的一种社会机制”。<sup>⑥</sup>伊本·赫勒敦指出：部落中的圣徒能够教化 and 团结部落民。<sup>⑦</sup>即将松散的部落社会整合为一个整体，将伊斯兰信仰融入部落传统习俗，呈现出独特的宗教信仰体系。在部落民看来，世俗的部落习惯法就是最纯粹的伊斯兰法。<sup>⑧</sup>塔利班的宗教观念无疑受到部落传统的强烈影响。

籍此，伊斯兰教深度嵌入阿富汗部落社会，并呈现出与城市伊斯兰信仰不同的特征。宗教与部落社会结合，进而建构了相对稳定的结构。部落社会尽管处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外，缺乏强有力的公共权威，但仍然维系着基本的社会秩序。这是伊斯兰教在部落生态之下的独特呈现，并以部落文化重新定义宗教，使部落属性和伊斯兰属性相互内化。上述特征并非阿富汗的个案，在中东其他的一些传统部落社会中不同程度存在。<sup>⑨</sup>特别是，宗教力量对于部落社会的聚合作用影响巨大，在伊斯兰世界反复显现，并至今仍然有其回响。<sup>⑩</sup>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阿富汗常年的战乱打破了部落社会的平衡，使宗教权威尤其是毛拉阶层借助迪欧班德派的宗教学校网络崛起，取代世俗权威，填补了部落社会的真空，并对部落社会实现了动员与整合。

## （二）迪欧班德派与部落社会的激进化

阿富汗是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sup>⑪</sup>亦是中东、中亚和南亚不同宗教文化的汇聚与交融之地。20世纪以来，阿富汗城市和精英阶层受到中东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出现了政治伊斯兰运动。在农村和部落之中则深受南亚的苏非主义的浸润，但部落地区仍然以世俗文化为主导。<sup>⑫</sup>然而，阿富汗问题产生后，国家迅速陷入动荡之中，部落社会传统的世俗文化受到极大的削弱。伴随着抗苏运动的兴起，以穆贾希丁为代表的“圣战”文化兴盛，并在阿富汗难民和部落民中渗

① Olivier Roy, *Islam and Resistance in Afghani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5.

② 毛拉的地位也不完全一致，一些部落的毛拉有权参与部落大会。Thomas Ruttig, “How Tribal Are the Tale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AAN) Thematic Report*, No. 4, 2010, p. 11.

③ Anand Gopa, Alex Strick van Linschoten, “Ideology in the Afghan Tali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Report*, 2017, pp. 10 - 12.

④ Ernest Gellner, *Muslim Society*, p. 123.

⑤ Olivier Roy, *Islam and Resistance in Afghanistan*, p. 38.

⑥ [美] 罗伯特·K. 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43页。

⑦ Ibn Khaldun, *The Muqaddimah: A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pp. 202 - 203.

⑧ Akbar S. Ahmed, David M. Hart eds., *Islam in Tribal Societies: From the Atlas to the Indus*, p. 312.

⑨ 相关研究参见 Ernest Gellner, *Saints of the Atlas*, London: The Trinity Press, 1969; Akbar S. Ahmed, David M. Hart eds., *Islam in Tribal Societies: From the Atlas to the Indus*.

⑩ 例如，近代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利比亚的塞努西运动，以及中东和非洲边远地区的一些伊斯兰主义运动。

⑪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⑫ 关于阿富汗的两种伊斯兰主义传统，参见闫伟：《阿富汗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变迁及其当代影响》，《南亚研究》2017年第1期第57-73页。

透。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南亚尤其是巴基斯坦的迪欧班德派（Deoband）。

迪欧班德派诞生于1867年，是对当时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以及南亚穆斯林社会衰落的直接回应。<sup>①</sup> 该派遵从哈乃斐学派，是自下而上的宗教复兴运动，具有瓦哈比派的色彩。<sup>②</sup> 概而言之，迪欧班德派具有强烈的宗教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倾向。第一，通过宗教“改革”（Islah），清除不符合正统教义的创制，回归经训，净化穆斯林社会，具有萨拉菲主义的色彩。第二，重视对伊斯兰教育制度的革新，借鉴英国的大学教育，创办了制度化的宗教学校（Madrasa）网络。与传统南亚的伊斯兰教育不同，迪欧班德派创办了众多相互联系的宗教学校网络，<sup>③</sup> 统一课程和培养方式，为教师发放薪酬，经济上依赖社会捐助，完全独立于国家。<sup>④</sup> 第三，重建乌里玛在宗教教育和社会的中心地位，通过培育乌里玛，重新塑造穆斯林的宗教信仰。第四，反对什叶派，<sup>⑤</sup> 反对苏非派对圣墓和圣徒的崇拜，强调苏非圣人的完美的德行，但反对苏非的灵性。<sup>⑥</sup> 需要指出，迪欧班德并不反对苏非派，它的许多领导人本身就属于苏非教团。第五，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政治性。迪欧班德派并非仅强调回归宗教传统，而是具有极强的人世性和实践性。它源于反抗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20世纪80年代之后，巴基斯坦的迪欧班德派出现了军事化的倾向，突出“圣战”的地位。<sup>⑦</sup>

因此，迪欧班德派形成了以新式的宗教学校网络为中心，由乌里玛领导，强调回归经训的萨拉菲主义运动。迪欧班德明确反对恐怖主义，<sup>⑧</sup> 但其思想和社会政治实践客观上为南亚尤其是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宗教极端主义提供了土壤，以至于一些西方学者将之称为“恐怖主义工厂”<sup>⑨</sup>。长期以来，迪欧班德派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普什图人中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派别。<sup>⑩</sup> 它所属的宗教学校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在阿富汗问题产生之前，迪欧班德派的宗教教育已渗透到部落社会。但由于与部落传统相悖，影响不大。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迪欧班德派保守的宗教思想与阿富汗的乱局相结合，根本性地改变了部落社会的文化和宗教信仰。

阿富汗问题爆发后，数以百万计的普什图难民逃往巴基斯坦。其中大部分的难民具有部落身

- 
- ① 关于迪欧班德派的起源，Barbara Daly Metcalf, *Islamic Revival in British India: Deoband, 1860 - 19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 ② 迪欧班德派受到瓦利乌拉（Shah Waliullah）的深刻影响，后者与瓦哈卜师出同门，该派一直与瓦哈比派具有联系。但两者分属不同的教法学派，在具体的宗教观念上存在差异。Jawad Syed, Edwina Pio, Tahir Kamran, Abbas Zaidi, *Faith-Based Violence and Deobandi Militancy in Pakista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139 - 140.
- ③ 最初创办的宗教学校位于德里东北部的迪欧班德，该派因此得名。这所学校名为“迪欧班德经学院”（Darul Uloom Deoband）是迪欧班德派的中心。如今，该派的宗教学校遍及南亚、非洲、英美等国，达到数千所之多。Luv Puri, “The Past and Future of Deobandi Islam”, *CTS Sentinel*, Vol. 2, Issue 11, 2009, p. 20.
- ④ 这些新式的宗教学校往往独立于清真寺。
- ⑤ Dietrich Reetz, *The Deoband Universe: What Makes a Transcultural and Transnational Educational Movement of Islam?* Master Thesi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40.
- ⑥ Brannon D. Ingram, *Revival from Below: The Deoband Movement and Global Islam*,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 pp. 11 - 16.
- ⑦ 相关论述参见 Jawad Syed, Edwina Pio, Tahir Kamran, Abbas Zaidi, *Faith-Based Violence and Deobandi Militancy in Pakistan*, 2016.
- ⑧ 2009年，“迪欧班德经学院”发布法特瓦，谴责一些以伊斯兰教为名的恐怖主义活动。Luv Puri, “The Past and Future of Deobandi Islam”, *CTS Sentinel*, Vol. 2, Issue 11, 2009, p. 21.
- ⑨ Peter Bergen, Swati Pandey, “The Madrassa Scapegoa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2, 2006, p. 117.
- ⑩ Luv Puri, “The Past and Future of Deobandi Islam”, *CTS Sentinel*, Vol. 2, Issue 11, 2009, p. 19.

份。此时，迪欧班德派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建立了数百所宗教学校，收容难民，并为之提供免费的宗教教育、食物、住所、生活津贴和军事训练，灌输迪欧班德派保守的宗教思想。<sup>①</sup>特别是，该派将阿富汗难民的迁徙附会为伊斯兰新的“希吉拉”，以圣战的口号动员阿富汗人反对苏联的入侵。由此，阿富汗诞生了“穆贾希丁”（Mujahideen）<sup>②</sup>阶层。他们大都受训于迪欧班德派的宗教学校，具有较为激进的宗教思想，以及强调通过武装圣战的方式实现宗教诉求，成为阿富汗抵抗运动以及其后的塔利班运动最重要的来源。这些圣战者大部分是15-20岁的年轻人<sup>③</sup>。“圣战文化”影响了阿富汗的一代人，导致部落社会的保守化，使部落社会长期以来较为盛行的宗教宽容、世俗文化受到根本性的动摇。<sup>④</sup>因此，阿富汗问题的爆发，使迪欧班德派保守的宗教思想和宗教网络深度嵌入部落社会，并且将部落的毛拉阶层纳入了统一的宗教网络，改变了部落社会的传统宗教文化。这为塔利班运动的崛起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宗教文化的支撑。

### （三）部落传统威权的解构与毛拉阶层的崛起

阿富汗冲突在重塑部落社会文化的同时，也解构了部落社会的传统权威结构。长期以来，宗教与世俗权威并立，两者相互制约和互补是部落社会得以稳定的关键。其中，世俗权威处于主导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来，阿富汗对于部落社会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以部落首领为代表的世俗权威。<sup>⑤</sup>阿富汗问题产生后，首领受到了人民民主政权和圣战者的双重压力，逐渐走向衰亡。大量部落和家族首领遭到镇压，或被迫流亡国外。<sup>⑥</sup>难民进入迪欧班德派的宗教学校，进而塑造了更具普遍性的宗教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部落和家族认同。<sup>⑦</sup>阿富汗部落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传统社会秩序呈现出紊乱的状态。

相对于世俗权威的衰落，部落社会中的宗教阶层借助迪欧班德派的宗教网络迅速崛起，出现了所谓的“新汗”（new Khan）或“伊斯兰汗”（Islamic Khan）。<sup>⑧</sup>他们逐渐取代世俗权威成为部落社会的主导力量，并以此重组部落社会。这些穆贾希丁成为阿富汗抗苏运动的主力 and 领导力量。从社会构成来看，穆贾希丁也分为不同的层次。源于城市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和著名苏非领袖等精英阶层，构成了抵抗运动的领导层，即所谓的“七党联盟”。<sup>⑨</sup>他们在部落社会中的影响力十分有限。部落社会的传统的毛拉，或者经由宗教学校培养的毛拉则成为抵抗运动的基层。他们深度融入部落社会之中，动员和组织部落民抵抗苏联和人民民主政权的统治，成为抵抗运动的

① Ahmed Rashid, "The Taliban: Exporting Extremism",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6, 1999, p. 26.

② 源自阿拉伯语 مجاهدين，意为“圣战者”。

③ Olivier Roy, *Islam and Resistance in Afghani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54 - 155.

④ 如前所述，由于部落社会中缺乏乌里玛阶层，宗教信仰是否正统并非人们关注的重点，重要的是穆斯林身份。Ahmed Rashid, "The Taliban: Exporting Extremism",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6, 1999, pp. 24 - 25.

⑤ 闫伟：《阿富汗穆沙希班王朝的部落社会治理及启示》，《西亚非洲》2017年第2期第119-121页。

⑥ 在东部和边远地区，特别是游牧部落中，传统的部落首领仍发挥着主导作用。Olivier Roy, *Islam and Resistance in Afghanistan*, pp. 150 - 153; Jennifer Brick Murtazashvili, *Informal Order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xxxi.

⑦ Kaja Borchgrevink, *Beyond Borders: Diversity and Transnational Links in Afghan Religious Education*,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PRIO), 2010, p. 53, [https://www.files.ethz.ch/isn/144231/PRIO%20Paper\\_%20Borchgrevink\\_%20Beyond%20Borders%20Diversity%20and%20Transnational%20Links%20in%20Afghan%20Religious%20Education\\_September%202010.pdf](https://www.files.ethz.ch/isn/144231/PRIO%20Paper_%20Borchgrevink_%20Beyond%20Borders%20Diversity%20and%20Transnational%20Links%20in%20Afghan%20Religious%20Education_September%202010.pdf).

⑧ Antonio Giustozzi, *Empires of Mud: War and Warlords in Afghanistan*,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9, p. 34.

⑨ Dr Nabi Misdaq, *Afghanistan: Political Frailty and External Interfer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51.

主力。他们虽然隶属于特定的宗教抵抗组织，但与后者存在尖锐的矛盾。<sup>①</sup>

与部落社会中传统的宗教人士相比，新崛起的毛拉阶层并不依赖特定的地方化的家族，而是属于庞大的迪欧班德派的宗教学校和宗教组织网络。他们就是迪欧班德派一直着力培养的乌里玛，能够通过这一宗教网络获取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与动员。<sup>②</sup> 宗教学校成为穆贾希丁源源不断的蓄水池和招募地，并为阿富汗输送以“圣战”为己任的毛拉。<sup>③</sup> 故此，宗教人士尤其是毛拉阶层形成了具有相对统一宗教观念、旨趣（迪欧班德派）和广泛联系与相互认同的群体。他们数量巨大，在迪欧班德派宗教学校学成后，一些人获得“毛拉维”（Mawlawi）的头衔，回到阿富汗后将已有或新建的宗教学校改造为迪欧班德派的学校，进而成为迪欧班德派在阿富汗崛起的组织基础。<sup>④</sup> 他们沿袭了迪欧班德派反对什叶派，也反对部落地区的圣人和圣墓崇拜的思想，使部落社会中的圣徒阶层开始消亡。毛拉取而代之成为部落社会中伊斯兰的代言人。

藉此，以部落首领和圣徒为代表的世俗和宗教二元权威结构解体。毛拉阶层取而代之，逐渐成为部落社会的主导力量。<sup>⑤</sup> 第一，随着传统权威的破灭，部落社会处于失序状态，毛拉阶层以沙里亚法取代世俗的部落习惯法，维持部落社会的秩序，充当卡兹的角色。沙里亚法成为部落社会解决冲突的最重要的规范。<sup>⑥</sup> 传统的世俗部落大会也被具有宗教色彩的舒拉所代替。<sup>⑦</sup> 第二，毛拉通过迪欧班德派的宗教网络（学校和清真寺）的动员，成为抵抗运动的基层组织者和领导人。<sup>⑧</sup> 第三，借助反对苏联的“圣战”氛围，推动部落社会的保守化。<sup>⑨</sup> 第四，这些毛拉通过抵抗运动从境外获取大量的资源和经济援助，为部落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毛拉阶层兼具司法、教育、宗教、军事和经济职能，成为部落社会事实上的掌权者。这根本上地改变了部落社会原有的生态。

#### （四）塔利班运动赖以存续的微观社会生态

1994年，塔利班在阿富汗各派军阀的混战中异军突起，几乎统一了阿富汗。阿富汗战争之后，塔利班又迅速实现重组，重新席卷阿富汗。塔利班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除了一定程度上迎合普什图人的权力诉求外，还具有深刻的微观社会背景。近四十年的战乱造成了部落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根本性变化，以塔利班为主体的毛拉阶层深度嵌入部落社会之中，进而

① Gilles Dorronsoro, *Revolution Unending: Afghanistan: 1979 to Presen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5, pp. 147 – 149.

② Nasreen Akhtar,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the Talib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ld Peace*, Vol. 25, No. 4, 2008, p. 58.

③ Kriti M. Shah, “The Pashtuns, the Taliban, and America’s Longest War”, *Asian Survey*, Vol. 57, No. 6, 2017, p. 995.

④ Olivier Roy, *Islam Radicalism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UNHCR, 2002, p. 10; <https://www.refworld.org/pdfid/3c6a3f7d2.pdf>

⑤ 这一现象也出现在20世纪70–80年代巴基斯坦的普什图部落，Kriti M. Shah, “The Pashtuns, the Taliban, and America’s Longest War”, *Asian Survey*, Vol. 57, No. 6, 2017, pp. 1000 – 1001.

⑥ Olivier Roy, *Islam and Resistance in Afghanistan*, pp. 153 – 156.

⑦ Thomas Ruttig, “How Tribal Are the Tale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AAN) Thematic Report*, No. 4, 2010, p. 8.

⑧ Kaja Borchgrevink, *Beyond Borders: Diversity and Transnational Links in Afghan Religious Education*,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PRIO), 2010, p. 56, [https://www.files.ethz.ch/isn/144231/PRIO%20Paper\\_%20Borchgrevink\\_%20Beyond%20Borders%20Diversity%20and%20Transnational%20Links%20in%20Afghan%20Religious%20Education\\_September%202010.pdf](https://www.files.ethz.ch/isn/144231/PRIO%20Paper_%20Borchgrevink_%20Beyond%20Borders%20Diversity%20and%20Transnational%20Links%20in%20Afghan%20Religious%20Education_September%202010.pdf).

⑨ Anand Gopa, Alex Strick van Linschoten, “Ideology in the Afghan Tali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Report*, 2017, pp. 17 – 20.

构筑了相对稳定的新结构。这是塔利班崛起以及赖以生存的微观社会生态。

塔利班运动具有庞大的宗教网络作为支撑。“塔利班”(طالب)一词为“宗教学生”之意,在该运动兴起之前便已广泛流传于阿富汗的穆贾希丁之间。这里的宗教学生大都就读于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尤其是迪欧班德派的宗教学校。<sup>①</sup>塔利班运动的主力正是这些宗教学校的学生,在抗苏运动期间已在部落社会生根。<sup>②</sup>塔利班利用了迪欧班德派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宗教网络,并且得到后者的鼎力支持,迅速实现了社会动员。<sup>③</sup>塔利班掌权后,将阿富汗境内的宗教学校交由隶属于巴基斯坦迪欧班德派的“伊斯兰教士协会”(JUI)打理。<sup>④</sup>因此,塔利班运动并不是新的社会力量,更多是将这些圣战中已崛起的毛拉阶层进行动员和联合,其背后有着庞大的迪欧班德派的宗教网络支撑。

此外,塔利班在部落社会中具有合法性和支持者。塔利班成员大都具有部落背景,熟悉部落社会的环境与运行规则。虽然塔利班成员的部落认同较为淡化,<sup>⑤</sup>但他们出身于部落社会,对于习惯法和社会规则捻熟于心,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阿富汗部落的权力诉求。即普什图人的主导地位、部落的自治和部落秩序的维护等。塔利班最初与部落首领合作,以取得后者的支持。但掌权之后,逐渐取部落首领而代之。<sup>⑥</sup>同时,部落社会具有反对外部干涉和入侵,以及强烈的复仇文化。塔利班则利用自身的宗教属性,将部落社会联合起来反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占领,以及领导部落民向西方驻军复仇。<sup>⑦</sup>在坎大哈,1/3的家庭有成员丧生于西方驻军之手,其中的半数家庭有成员加入反政府组织,进行复仇。<sup>⑧</sup>这既是阿富汗宗教力量与部落的再一次融合,同时也赋予了塔利班以合法性。<sup>⑨</sup>从意识形态上看,长期的战乱造成部落社会“圣战”文化盛行,社会保守化与极端化。这与塔利班所奉行的意识形态高度吻合。塔利班在部落社会中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塔利班运动兴起体现了阿富汗社会的重大变化。部落社会内部传统的宗教与世俗的二元权威结构趋于解构,以毛拉为主体的塔利班运动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填补了权力真空并构筑了权力基础,使部落社会呈现出新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同时,塔利班借助迪欧班德派跨国的宗教网络,将部落社会纳入更为广阔的伊斯兰世界,并使之逐渐保守化。这既是塔利班在20世纪90年代可以

① 截止2012年,迪欧班德派宗教学校占巴基斯坦宗教学校总数的65%以上。Sarah Ashraf,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vided by Madrassas in the Afghanistan-Pakistan Boundary Area*, Arts &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2012, p. 11, <https://ahrc.ukri.org/documents/project-reports-and-reviews/ahrc-public-policy-series/religious-education-and-training-provided-by-madrassas/>

② Nasreen Akhtar,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the Talib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ld Peace*, Vol. 25, No. 4, 2008, p. 57.

③ 塔利班运动兴起后,得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迪欧班德派宗教学校,尤其是著名的“哈卡尼亚经学院”(Dar ul Uloom Haqqaniah)大力支持。

④ Ahmed Rashid, "The Taliban: Exporting Extremism",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6, 1999, p. 26.

⑤ Kriti M. Shah, "The Pashtuns, the Taliban, and America's Longest War", *Asian Survey*, Vol. 57, No. 6, 2017, p. 1001.

⑥ Jennifer Brick Murtazashvili, *Informal Order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60.

⑦ 在传统部落文化中,部落的独立与复仇事关“荣誉”,失去“荣誉”的部落无法生存。阿富汗塔利班一直将美国撤军作为与政府和谈的先决条件,即基于部落的自治传统。

⑧ Kriti M. Shah, "The Pashtuns, the Taliban, and America's Longest War", *Asian Survey*, Vol. 57, No. 6, 2017, p. 1004.

⑨ 如前所述,阿富汗部落社会具有分裂性,难以联合起来。宗教是唯一能够动员和领导部落社会进行抗争的力量。

席卷阿富汗的原因；也是在北约和阿富汗政府双重打击下，塔利班不仅未被消灭，反而日益强大的社会根源。但是，塔利班运动对部落社会的整合仍然有其限度，两者并未合二为一。特别是，在一些苏非派兴盛或者非普什图部落中，塔利班运动遭到抵制。

### 三、部落社会与新塔利班运动的组织演化和适应

阿富汗战争之后，塔利班政权迅速垮台。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的重压下<sup>①</sup>，塔利班并未销声匿迹，反而迅速完成重组，最终夺取政权，并成为影响当前阿富汗局势乃至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关键因素。塔利班之所以能够重新崛起，固然与外部各种力量的支持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常年战乱塑造的部落社会结构并未随着重建的启动而根本改变，前者恰好是塔利班运动得以再生的社会基础。那么，阿富汗社会尤其是部落组织如何持久地支撑塔利班？按照杰里米·温斯坦（Jeremy M. Weinstein）的理论，像塔利班这样的反政府武装的生存，需要得到社会的“赋能”（Endowments），即塔利班在社会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规范等方面与地方社会的高度契合性。<sup>②</sup> 塔利班依赖横向和纵向两种社会网络实现社会动员，建构社会基础：<sup>③</sup> 即以毛拉和迪欧班德宗教学校为主的横向宗教网络，以及塔利班与部落社会联系的纵向网络。<sup>④</sup> 塔利班正是利用这些社会网络对其组织进行重构，以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现实。

#### （一）塔利班与部落社会的纵向连接网络

塔利班重组后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阿富汗南部、东部和西部的部落地区，部落社会仍然是其基础。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政权治下，部落社会中传统的二元权威格局受到冲击，以毛拉为代表的宗教人士逐渐处于独大的地位，而以部落首领为表征的传统世俗权威消亡。阿富汗战争之后，塔利班的毛拉或是战败身亡，或是四散溃逃。<sup>⑤</sup> 部落社会出现了权力的真空，面临着新一轮的洗牌。一方面，部落制度具有坚韧性，传统世俗权威和制度再次出现，一些基层的支尔格会议得以重建。但部落首领的消亡，<sup>⑥</sup> 使社会进一步分裂，无法解决部落面临的安全和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sup>⑦</sup>

另一方面，阿富汗新政权与塔利班开始角逐部落社会。阿富汗政府将部落社会视为现代国家的障碍，试图打破部落传统自治，建立直接统治。<sup>⑧</sup> 同时，阿政府并不重视部落地区的习俗，在部落社会中建立男女同班的学校，赋予女性权力，削弱伊斯兰教的影响等触犯了部落社会的习俗。<sup>⑨</sup> 重建初期，部落地区的大量地方官员和安全人员属于少数民族，对于以普什图人为主体的

①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阿富汗的驻军。

② Jeremy M. Weinstein, *Inside Rebellion: The Politics of Insurgent Vio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7.

③ Anchita Borthakur, Angana Kotokey, “Ethnicity or Religious? The Genesis of The Taliban Movement in Afghanistan”, *Asian Affairs*, Vol. 51, Issue 4, 2020, p. 8.

④ 相关论述参见：Paul Staniland, *Networks of Rebellion: Explaining Insurgent Cohesion and Collaps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0–24.

⑤ 战争期间，8000–12000名塔利班成员（约20%）身亡，高层大部分逃往巴基斯坦，藏匿起来。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 at War: 2001–201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2019, pp. 17–18.

⑥ 传统上，部落首领（khan）控制了多个村庄，他们的消亡使部落社会进一步碎片化。Jennifer Brick Murtazashvili, *Informal Order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 p. xxix.

⑦ Jennifer Brick Murtazashvili, *Informal Order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 p. xxx.

⑧ Ibid., p. xxxii.

⑨ 在部落社会中，女性是家族荣誉的象征。要求男女同校和妇女摘掉头巾相当于触犯了荣誉。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 at War: 2001–2018*, p. 240.

部落民打击报复，将普什图部落民等同于塔利班，引发了部落民的强烈不满。<sup>①</sup> 政府也无力维持部落地区的秩序，尤其是消除塔利班对部落组织的威胁。美国等西方军队在打击塔利班之时存在对平民的伤害，进一步损害了阿富汗政府的权威。<sup>②</sup> 这为塔利班重建与部落社会的联系提供了机遇。

塔利班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公共产品，满足了部落社会的诉求。一是为部落社会提供安全保障。部落通过支持塔利班，获得后者在安全上的承诺，不仅不再侵犯部落组织，而且塔利班武装还对村庄进行巡逻，制止偷盗和抢劫等行为。二是解决部落组织的矛盾。由于部落社会原有的冲突化解机制消亡，社会内部的矛盾很难自行解决。政府的司法部门效率较低，且成本高昂。塔利班推行的伊斯兰教法成为化解部落冲突的首选。三是改善部落社会的经济状况。与政府的禁毒相反，塔利班运动并不反对农村的毒品生产，并通过招募村民加入塔利班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塔利班基层武装的待遇与政府职员相当。<sup>③</sup> 四是许多阿富汗部落通过支持塔利班提升自身的地位。新政权建立之后，开始支持之前遭到塔利班压制的部落。如杜兰尼部落联盟的波波尔查伊 (Popalzai)、阿里查伊 (Alizais) 和阿里克查伊 (Alikozais) 等部落，授予他们地方要职，而冷落和打压曾支持塔利班政权的伊萨克查伊部落等。后者只能通过与塔利班结盟，以改变自身边缘化的地位。<sup>④</sup> 五是塔利班与部落社会具有相互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在部落社会中，普遍认为伊斯兰教法就是部落习惯法。两者都具有保守性，隐含着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倾向。<sup>⑤</sup>

那么，塔利班与部落社会属于相互独立的两个社会空间，具有各自的独立的组织结构。两者的纵向联系又是如何重建？一般而言，当社会组织在地方社会招募，并且服务于本地社会之时，属于“强纵向社会网络”，社会动员和资源提取能力最强。<sup>⑥</sup> 塔利班属于这一情形，主要通过两条纽带实现对部落与塔利班的连接。一是村庄中的毛拉阶层。塔利班掌权时，毛拉甚至充当一些村庄和部落的统治者。即便阿富汗战争结束后，毛拉和清真寺在部落社会中仍普遍存在。毛拉深入部落社会，与塔利班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塔利班伸向部落社会的触手。他们在塔利班招募部落民，游说部落首领，为塔利班提供情报和庇护，以及宣传保守的宗教思想等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二是塔利班以本地人为主体的基层影子政权和武装组织。塔利班在村庄中招募武装（乡村阵线，village mahaz），并驻扎在当地。他们并非全职武装，寓兵于农，受塔利班地方的影子政府节制，但事实上服务于村庄的利益。塔利班借此将自身与部落的利益绑定，在部落社会中得到了立足点。与20世纪90年代执政期间相比，塔利班不再是部落社会的统治者，两者更多的是合作关系，通过毛拉和塔利班基础武装对部落社会实现间接控制与影响。

## （二）塔利班“多中心”的横向宗教组织网络

横向的社会网络以特定的职业或者社会阶层为主体，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超越了一定的地域限制。<sup>⑦</sup> 从形式上看，塔利班运动作为一场保守的宗教政治运动，以毛拉和宗教学生为身份标识，是典型的横向社会网络。同时，塔利班运动主要基于迪欧班德派的宗教网络，具有共同的宗教观念和相对一致的组织形态。塔利班当政期间，尝试建构统一甚至集权

① 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 at War: 2001 - 2018*, p. 25.

② Anand Gopa, Alex Strick van Linschoten, "Ideology in the Afghan Tali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Report*, 2017, p. 4.

③ 塔利班基层武装月薪约为300美元，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 at War: 2001 - 2018*, p. 239.

④ 塔利班前领导人曼苏尔就出自伊萨克查伊。Theo Farrell, "Unbeatable: Social Resources, Military Adaptation, and the Afghan Taliban",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Vol. 1, No. 3, 2018, p. 65.

⑤ Anchita Borthakur, Angana Kotokey, "Ethnicity or Religious? The Genesis of The Taliban Movement in Afghanistan," *Asian Affairs*, Vol. 51, Issue 4, 2020, p. 12.

⑥ Paul Staniland, *Networks of Rebellion: Explaining Insurgent Cohesion and Collapse*, pp. 22 - 23.

⑦ Ibid., pp. 21 - 22.

的体制，属于“强横向网络”。2001年之后，尽管塔利班仍然标榜迪欧班德派的宗教观念，从其所属的宗教学校进行招募，并以毛拉主导的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网络为中心。<sup>①</sup>但塔利班更多的的是一个多中心、地方化和具有浓厚部落色彩的松散组织。

塔利班运动的重组是自下而上的过程，由自发的抵抗运动逐渐联合为松散的反政府组织联盟，其中许多基层武装与之前的塔利班并无关联，甚至还对其持敌对立场。<sup>②</sup>领导中心为奎达舒拉（Quetta Shura），其核心成员大都属于受到迪欧班德派影响的毛拉，为前塔利班政权领导人。<sup>③</sup>塔利班运动的多中心主要体现在：

第一，塔利班运动由部落的地方力量联合而成，并非是统一和集权的宗教政治运动。奎达舒拉下设五个地方性的舒拉（分支）。其中，白沙瓦舒拉（Peshawar Shura）、米兰沙舒拉（Miran Shah Shura）、马什哈德舒拉（Mashhad Shura）、北方舒拉（The Shura of the North）、拉苏尔舒拉（Rasool Shura）都处于高度的自治状态，奎达舒拉无权节制。<sup>④</sup>这些地方性的舒拉具有独立的资金来源，相互激烈竞争，类似于地方军阀，甚至与奎达舒拉矛盾重重。

第二，塔利班在军事组织上高度分裂。塔利班武装力量大致分为两种类型：（1）地方影子政府控制的武装，包括村庄的塔利班武装；（2）以“大阵线”（loy Mahaze）为主体的机动部队，为塔利班的主力。前者一般控制在奎达舒拉手中，但高度的部落化，大部分的地方武装和影子政府按照部落组织为界；<sup>⑤</sup>“大阵线”围绕具有名望的宗教领袖组建，在资金的筹措、组织结构、成员的招募上具有独立性，但也依赖家族和血缘等关系。

第三，塔利班作为横向网络，在社会构成上具有多元性的特征。塔利班主要由阿富汗人尤其是普什图人构成，外籍的成员并不占多数。<sup>⑥</sup>但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塔利班已不完全由宗教阶层构成。<sup>⑦</sup>主要存在两大群体：一是从巴基斯坦宗教学校招募的学生，塔利班各派以特定的宗教学校为据点；二是地方化的成员，大都不具有宗教学生或者毛拉的背景。据估计，在阿富汗的影子政府中，1/4的地方统治者没有宗教教育的经历。这一现象在基层更加明显，坎大哈的一支由18人组成的武装中，只有1人曾接受宗教教育。<sup>⑧</sup>这也导致塔利班的意识形态纯度的下降。

因此，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新塔利班在组织结构、人员构成和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十分松散，受到宗教和部落的双重纽带的影响。塔利班更多的是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占领的宗教政治运动联盟，并非统一的组织。其意识形态也逐渐转向温和，矛头由内而外，指向反对西方对阿富汗的占领，而非仅以伊斯兰传统重塑穆斯林社会。塔利班的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新的社会现实的适应，其中具有深刻的部落文化内涵。

① Thomas Ruttig, “How Tribal Are the Tale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AAN) Thematic Report*, No. 4, 2010, p. 2.

② 比如，东部的一些武装属于伊斯兰党，长期反对塔利班政权。但2001年之后，这些武装组织形式上加入了重组之后的塔利班。

③ “奎达舒拉”位于巴基斯坦的奎达，也被称为“拉巴里舒拉”（Rabbari Shura）。Abubakar Siddique, “The Quetta Shura: Understanding the Afghan Taliban’s Leadership”, *Terrorism Monitor*, Vol. XII, No. 4, 2014, pp. 5–7.

④ 这些舒拉大都集中于特定的地域，与当地的部落具有联系。米兰沙舒拉就是塔利班中最为激进的“哈卡尼网络”。2021年，塔利班上台后，上述的分支也存在一定的分化与重组。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在夺取政权之前的塔利班运动。

⑤ 80–90%的塔利班武装在其所属的部落组织周边活动。Thomas Ruttig, “How Tribal Are the Tale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AAN) Thematic Report*, No. 4, 2010, p. 14.

⑥ 相较而言，哈卡尼网络中外籍成员较多。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 at War: 2001–2018*, p. 82.

⑦ EASO, *Afghanistan Taliban Strategies-Recruitment*, Bureau Européen d’Appui pour l’Asile, 2012, pp. 25–43.

⑧ Anand Gopa, Alex Strick van Linschoten, “Ideology in the Afghan Tali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Report*, 2017, p. 40.

### (三) 塔利班对于部落社会的适应与超越

上述两种社会网络依据不同的原则进行建构。纵向的部落社会网络依赖血缘和地缘关系；横向的宗教网络则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师承关系等为基础，超越了狭隘的血缘关系。<sup>①</sup>但两者并非并行不悖，而是存在复杂的互动。横向宗教组织网络具有地方化尤其是部落化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塔利班运动在社会组织上具有“强纵向—弱横向”的趋势。从深层而言，塔利班植根于部落社会，并随着阿富汗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迎合部落社会的诉求，以发展出适应部落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可以说，部落社会已深刻地映射到塔利班的方方面面。

第一，塔利班运动的内部分歧是部落社会内在裂痕的映射。<sup>②</sup>塔利班的成员大都出自部落社会，传统的部落认同观念同样也浸染到塔利班。特别是，血缘关系与认同成为除宗教认同之外，塔利班进行组织的重要原则。塔利班内部的各派系大都具有特定部落和家族背景。从部落联盟层面来看，塔利班内在分裂体现了阿富汗两大部落联盟的长期对抗。<sup>③</sup>

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主要以普什图族的吉尔查伊部落联盟（Ghilzai）为主体，包括奥马尔在内的领导人绝大多数出自该部落联盟。<sup>④</sup>吉尔查伊部落联盟在阿富汗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而杜兰尼部落联盟则在1978年之前一直垄断阿富汗的权力。阿富汗重建之后，杜兰尼部落联盟逐渐掌控塔利班，<sup>⑤</sup>奎达舒拉的主要根据地就位于该部落联盟聚居的南部地区。奥马尔死后，塔利班的后两任领导人曼苏尔、阿洪扎达（Haibatullah Akhunzada），以及巴拉达尔皆属于杜兰尼部落联盟。正如一位塔利班成员所言：“塔利班不能将所有权力都给了杜兰尼人，应该兼顾吉尔查伊等其他部落。”<sup>⑥</sup>塔利班各主要派系与阿富汗部落边界基本重合。奎达舒拉的控制范围主要位于南部的普什图人聚居区，马什哈德舒拉则以吉尔查伊部落联盟为主，米兰沙舒拉得到东部卡兰里部落联盟的支持。<sup>⑦</sup>另外，部落认同是塔利班领导人权力的基础。米兰沙舒拉一直被哈卡尼家族控制。<sup>⑧</sup>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也具有深刻的部落背景。<sup>⑨</sup>

第二，塔利班松散的结构与传统部落政治文化相契合。塔利班运动存在一种明显的趋势，即越是基层组织，其部落属性越是明显。在乡村一级的组织中，塔利班往往是由当地村民构成，一般不具有宗教学校的背景。换言之，乡村的塔利班武装就是乡村自治性的武装组织。他们甚至唯村庄长老之命是从，并不欢迎村庄之外的塔利班力量的活动。<sup>⑩</sup>地方影子政府往往也是由本地的

① Jennifer Brick Murtazashvili, *Informal Order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 p. 27.

② Thomas Ruttig, “How Tribal Are the Tale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AAN) Thematic Report*, No. 4, 2010, p. 13.

③ Anchita Borthakur, Angana Kotokey, “Ethnicity or Religious? The Genesis of The Taliban Movement in Afghanistan”, *Asian Affairs*, Vol. 51, Issue 4, 2020, p. 9.

④ Ahmed Rashi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52 - 255.

⑤ Michael Semple, *Rhetoric,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Taliban Movement*,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14, p. 23.

⑥ 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 at War: 2001 - 2018*, p. 234.

⑦ 相对而言，白沙瓦舒拉受到部落影响较小，并且着力在非普什图人中发展。关于塔利班各派的分布参见 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 at War: 2001 - 2018*, pp. 271 - 274.

⑧ 哈卡尼家族属于阿富汗东部卡兰里部落联盟（Karlandri）的扎德兰部落（Zadran）。Scott Atran, “A Question of Honour: Why the Taliban Fight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38, No. 3, 2010, p. 350.

⑨ Theo Farrell, “Unbeatable: Social Resources, Military Adaptation, and the Afghan Taliban”,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Vol. 1, No. 3, 2018, p. 65.

⑩ 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 at War: 2001 - 2018*, p. 192.

部落或家族把持，代表的是本地部落社会的利益。这便使部落社会自治传统外化为塔利班运动的组织原则。

因此，塔利班的基层大都以基于特定部落组织的基础，致使其在组织上十分松散。塔利班领导人地位类似于传统部落首领，只是“众人中平等的一员”（*primus inter pares*），没有绝对权威。塔利班更多的是一个相互分权和自治的网络，并非统一的组织。一些塔利班领导人试图进行集权化的改革。2015年，曼苏尔上台后一直着力消除地方分权，加强奎达舒拉的权威，但并未成功。本质而言，塔利班运动是以部落社会为基础，其存续和发展依赖部落社会的支持。同时，塔利班成员，深受部落自治传统文化的影响。正如意大利学者古斯托齐（Antonio Giustozzi）所言：塔利班吸收了部落社会的政治传统，反对等级制和集权制。<sup>①</sup>可以说，塔利班运动对传统自治文化的汲取，赋予了塔利班运动以弹性。<sup>②</sup>但这也便衍生出塔利班运动的悖论：即部落组织为塔利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使其绵延不绝；但对于部落社会的依赖导致其无法形成统一的运动，限制了其行动力。

第三，塔利班运动的意识形态兼具伊斯兰主义与部落文化属性，渐趋务实与温和。塔利班运动深受迪欧班德派的影响，形式上强调超越了特定的部落、族群和地方组织。<sup>③</sup>但同样未能摆脱部落传统文化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当政期间，其宗教观念与政策强调回归伊斯兰传统。但也认为，部落伊斯兰教就是伊斯兰传统，也是先知的传统。<sup>④</sup>这与迪欧班德派等萨拉菲主义者主张的回归经训和先知时代具有明显的不同，他们往往还具有反对部落主义的倾向。塔利班强调伊斯兰信仰的外在性，通过规范着装、宗教仪式，禁止媒体和娱乐等体现内在宗教信仰。<sup>⑤</sup>同时，反对穆兄会、毛杜迪的伊斯兰促进会等现代政治伊斯兰。这体现了部落社会的封闭性，以及对外交往的受限。

2001年之后，部落社会本身发生了重要变化，大量难民回归、就媒体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步打破了部落社会文化的封闭性。塔利班的宗教观念也积极适应这些新变化。一是结合部落社会的文化，对于伊斯兰传统进行重新阐释。即西方正在摧毁阿富汗的传统与文化，是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最终目标是铲除阿富汗的伊斯兰文化。据此，当前部落社会的困局与西方的占领建立了逻辑联系。塔利班则成为部落伊斯兰传统与文化的捍卫者。一名塔利班成员指出：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而是一场捍卫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及民族认同与自由的圣战。<sup>⑥</sup>二是由信仰的外在性转向内在性，强调信仰的核心是内在的忠诚而非外在的宗教礼仪和象征。如果一名宗教信仰虔诚的毛拉与西方和前政府合作，他也是异教徒。三是开始对现代政治伊斯兰持积极态度，肯定中东各国穆兄会的成就。四是重新定义伊斯兰教中的“战争之地”（*dar ul-harb*）概念。<sup>⑦</sup>他们借用萨拉菲主义的观点认为，不论是否穆斯林政权，只要与美国合作就是“战争之地”和

① 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 at War: 2001 - 2018*, pp. 247 - 248.

② Thomas Ruttig, "How Tribal Are the Tale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AAN) Thematic Report*, No. 4, 2010, p. 2.

③ Ibid., p. 16.

④ Anand Gopa, Alex Strick van Linschoten, "Ideology in the Afghan Tali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Report*, 2017, pp. 1 - 2.

⑤ Antonio Giustozzi, *Koran, Kalashnikov, and Laptop: The Neo-Taliban Insurgency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2.

⑥ 反抗外部的入侵，保卫部落的“荣誉”也是部落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Anand Gopa, Alex Strick van Linschoten, "Ideology in the Afghan Tali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Report*, 2017, p. 33.

⑦ 相关讨论参见：Muhammad Mushtaq Ahmad, "The Notions of Dār al-Ḥarb and Dār al-Islām in Islamic Jurisprudenc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Ḥanafī School", *Islamic Studies*, Vol. 47, No. 1, 2008, pp. 5 - 37.

圣战的对象。这也成为塔利班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撤军后，继续发动攻势的合法性渊源。五是由于大量未接受宗教教育的平民加入塔利班，致使后者的宗教观念日益混杂。六是承认现行的民族国家体系和国际规则，将“圣战”的目标局限于国内。如今，塔利班的宗教观念仍然植根于部落社会传统，并未改变其传统和保守的宗教观念，变化的只是实现的手段。

塔利班运动已嵌入部落社会，同时也在不断适应部落社会的新变化。但这并不是说塔利班完全是一场部落运动，它一定程度上也超越部落社会。在阿富汗问题产生之前，部落社会处于“无政府之下的秩序”。但是，阿富汗战乱将原有的社会权力结构打破之后，部落社会陷入无序状态，塔利班重构了部落社会的秩序，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部落社会的整合与超越，并向后者提供急需的安全与秩序。这一方面体现在塔利班运动本身实现了对部落社会的动员，使之作为相对统一的整体呈现，超越了具体的部落组织纷争。<sup>①</sup>这是阿富汗宗教力量对部落社会整合的历史重现。另一方面，塔利班的意识形态也超越了具体的部落主义，<sup>②</sup>而是体现出宗教民族主义的特征。例如，强调阿富汗人的统一与团结等，同时隐含着普什图民族的权力诉求，但并未如同伊斯兰国那样具有全球性的议程。

当前，阿富汗阿富汗问题延续已逾40年，阿富汗重建也有20载。2021年，随着美国的撤军，加尼政府迅速崩溃，阿富汗塔利班再次夺取政权。这显示出在阿富汗这样以农村和部落为主体的国家，只有深度整合部落社会才有可能实现稳定。加尼政府的垮台在某种意义上源于西方施加的“民主制度”背离了阿富汗社会政治的主流传统，致使在部落社会中具有深厚基础的伊斯兰复兴填补权力空白，进而夺取政权。阿富汗再次面临着历史性的抉择。无疑，塔利班兼具部落社会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将深刻影响未来阿富汗政局的发展。

#### 四、余论：作为“小传统”的部落伊斯兰复兴运动

美国人类学家芮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提出了著名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分析框架。他认为：文明体系中存在两种传统：即由少部分思想家和哲人创造的“大传统”，以及大部分平民创造的“小传统”。大传统居于城市的学校和庙堂之上，小传统则浸润于农民与市井之中。<sup>③</sup>伊斯兰文明中同样存在大小传统之别。两者在宗教上呈现不同，并无价值上的高下之分。城市中的乌里玛、伊斯兰法学家、宗教领袖无疑是伊斯兰教的“大传统”，而普通平民尤其是部落社会则是“小传统”的代表。<sup>④</sup>这一范式突破了以往以宗教价值观念区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做法，<sup>⑤</sup>从社会结构的视角进行了新的阐释，进而发掘伊斯兰复兴运动根本性的社会差异。

事实上，这种小传统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并非新鲜事物，在历史上一直以不同形式呈现。奥斯曼帝国的兴起、波斯萨法维王朝、北非穆拉比特王朝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部落征服与宗教运动的结合。这些王朝最终将“小传统”转变为“大传统”。近代以来，阿富汗尼、哈桑·班纳、毛杜迪、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等属于“大传统”，代表精英阶层对于伊斯兰复兴的普遍性认知。塔利班运动代表的是高度部落化、地方化、社区化和本土化的宗教运动，属于“小传统”。诚如前

① Kriti M. Shah, “The Pashtuns, the Taliban, and America’s Longest War”, *Asian Survey*, Vol. 57, No. 6, 2017, p. 998.

② Thomas Ruttig, “How Tribal Are the Tale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AAN) Thematic Report*, No. 4, 2010, p. 2.

③ [美] 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与社会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王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5页。

④ 同上，第111-116页。

⑤ 将伊斯兰复兴运动分为现代主义（政治伊斯兰）和传统主义（萨拉菲主义）。

述，塔利班运动填补了部落社会的权力真空，为后者提供一定的法律和安全等公共产品。但塔利班运动也深受部落社会的影响，在伊斯兰教信仰、教法、组织结构与行为方式等都融入部落社会，涵化于部落传统和习惯。因此，其组织结构十分松散，伊斯兰信仰体系也较为庞杂。如今，西亚北非地区日益显现出从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直至萨赫勒地区的“动荡弧”<sup>①</sup>。这一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运动大都具有部落背景。

以塔利班运动作为个案，可以发现这种“小传统”的某些共性特征：其一，从宗教观念上看，部落的伊斯兰信仰与以城市乌里玛阶层为代表的正统伊斯兰教存在很大差异，前者更加保守，但也融合大量的部落文化习俗，使其宗教信仰与正统观念存在很大的偏差。事实上，这是通过部落文化的透镜审视伊斯兰主义。这也导致“小传统”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普遍抗拒现代政治，其社会治理能力有限。其二，往往生长于分支型部落社会（Segmentary-Society），即沿着宗族和谱系关系高度分裂的社会，缺乏公共权威，伊斯兰教成为其中的纽带和统一的力量。<sup>②</sup> 这导致部落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往往处于小规模的组织水平，难以联合为如同穆兄会、南亚的伊斯兰促进会那样组织严密的宗教运动。事实上，即便是塔利班背后存在超越特定部落，且十分强大的迪欧班德派宗教网络的支撑，但也难以实现完全的整合与统一。其三，一般发端于国家政治的边缘或者政治失序之地，是国家治理失败的产物。国家政治的衰朽与社会失序，导致部落社会难以维系，进而激活了宗教对于部落社会的整合能力，使部落与宗教深度融合。其四，由于产生于部落社会的失序状态，因此这种类型的宗教运动通常具有军事伊斯兰的特征。通过建立军事组织维护地方的安全。

农村和部落社会在西亚北非地区仍然占据主导，“小传统”的宗教运动在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它既体现了长期以来，城乡之间、精英与草根之间宗教观念和社会组织上的巨大差异，同时也凸显出该地区一些国家社会治理的失效。但是，在部落社会的独特结构中，伊斯兰教不只是一种信仰体系，还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动员与整合的作用，以及维护地方秩序和提供公共产品的功能。大小传统之别非源于宗教信仰形式，而是对城乡社会结构巨大差异的外化表达，满足了不同类型社会的宗教诉求。从根本上讲，伊斯兰的两大传统的分际在历史上是常态，体现了伊斯兰文明的多样性与适应性。当前的问题在于，国家整合势必要打破原有的宗教分布格局，实现两大传统的统一；而国家治理的失败以及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潮的兴起又为部落等地方社会力量与伊斯兰教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契机。以至于，一些部落伊斯兰复兴运动具有了极端化、军事化、圣战化的趋势，甚至成为一些极端组织的庇护所，对于当代中东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随着塔利班再度上台，这一宗教社会运动新模式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并为伊斯兰世界尤其是西亚北非的某些极端组织效仿，威胁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近年来，基地组织、伊斯兰国逐渐化整为零，在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上融入当地的部落和社区，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塔利班化”的取向，值得进一步关注。

（责任编辑：夏德美）

① 相关论述参见王涛、鲍家政：《恐怖主义动荡弧：基于体系视角的解读》，《西亚非洲》2019年第1期第114-139页。

② “分支型社会”理论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普理查德（E. E. Evans-Pritchard）提出，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分析中东的部落社会，主要以阿富汗的普什图部落、阿拉伯贝都因部落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一些部落为主。E. E. Evans-Pritchard, *The Nu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Akbar Ahmed, *The Thistle and the Drone: How America's War on Terror Became a Global War on Tribal Islam*, pp. 15-27.